

「語言的權力、權力的語言」專題引言

路丹妮 (Táňa Dluhošová) *

鄭文惠**

本期專題由捷克科學院亞非研究所研究員路丹妮 (Táňa Dluhošová) 與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特聘教授兼文學院數位人文研究中心主任鄭文惠共同籌劃主持，係捷克科學院亞非研究所與國立政治大學「觀念·話語·行動：數位視野下中國／臺灣多元現代性研究」科技部整合型計畫 (主持人：鄭文惠)、國立政治大學社資中心「中國近現代思想及文學史專業數據庫 (1830-1930)」教育部邁向頂尖大學計畫 (主持人：金觀濤、鄭文惠)、國立政治大學人文中心「形塑中國：中國認同與現代國家的形成」教育部邁向頂尖大學計畫 (主持人：金觀濤、鄭文惠)、國立政治大學文學院數位人文研究中心於2016年11月18-19日共同主辦之「語言的權力，權力的語言：概念／觀念史圖像中的文學、政治與歷史」國際學術會議¹部分論文的菁華呈現。

專題定名為「語言的權力、權力的語言」，主要關注以下三個面

* 路丹妮 (Táňa Dluhošová) 現為捷克科學院亞非研究所研究員。

** 鄭文惠現為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特聘教授兼文學院數位人文研究中心主任。

¹ 相關會議報導，參見黃璿璋：〈「語言的權力，權力的語言：概念／觀念史圖像中的文學、政治與歷史」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綜述〉《東亞觀念史集刊》第11期 (2016年12月)，頁455-473。

向：(一) 詞彙、概念與行動者：近現代中國／臺灣在政治論述中有哪些重要的關鍵詞彙？這些詞彙的意義為何？如何找出並確認其意義？這些詞彙在特定語境下所隱涵的意義為何？在政治論戰中，論戰者（政治人物與思想家、作家）所使用的語彙如何不同？參與政治論戰者如何使用因應不同的觀眾群（如不同社會背景、經濟條件或政治陣營與政治傾向）調整自己所傳遞的訊息？若將參與政治與公共論戰的行動者的背景，連結至其政治論述進行探討，是否能導向於有意義的結論？換句話說，所有可辨識的共同社會背景與政治觀點，彼此之間是否存在著相互關係？在近現代中國／臺灣歷史不斷變化的脈絡下，觀念／概念如何變遷？又是在哪些狀況下變遷？(二) 文學與政治、權力：文學與政治論述、政治決策以及政治實踐，彼此之間的相互關係為何？思想辯證與文學論述如何影響並進入政治決策過程中？權力與權力關係不同的觀念化（例如不同的隱喻形式）是否影響政治決策者與政治決策？政治期刊與官方語言之間的關係為何？是否互相影響？策略與回應之間的權力角力如何勾勒、銓解？審查制度對政治論戰造成哪些影響？在言論自由遭到限制的狀況下，參與政治論戰者是否找到論述自身的方式？審查制度對於公眾的政治觀點與觀點表達所產生的影響為何？語言的界線為何？語言權力的極限何在？勸導與宣傳的效果如何？在理性層次上的辯論是否具說服力？前提是純粹理性可以存在且被定義？非語言元素如機構、經濟力以及社會結構等，與語言之間的關係為何？(三) 語言、政治與歷史考察：歐美學界各種分析語言與觀念、歷史、政治關係的研究方法，無論是30年代諾夫喬伊（Arthur O. Lovejoy, 1873-1962）觀念史（History of Ideas）方法；或70年代以來劍橋學派政治哲學家普考克（J. G. A. Pocock）與斯金納（Quentin Skinner）思想史研究的語言論轉向（linguistic turn），所形成以話語為主的政治思想史研究；或德國概念史學派科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 1923-2006）等關注在社會結構中語義生成與演

變的歷史，透過概念的語義結構，揭示歷史變遷的特徵。² 凡此從詞彙學與歷史語義學的角度考察關鍵詞彙，以進一步探究主要政治觀念之間的關係，或將投入政治論戰的討論設想為試圖在一定歷史脈絡中達到確切目的的言論行動，或主張政治論述乃受制於當時的慣習，由特定時間中政治思潮的語言規則所框限，這些研究路徑是否彼此互斥，亦或可以共同合作，彼此辯證，帶出更多的研究成果？觀念史／概念史與思想史放在歷史考察的大架構中，其所處之位置與扮演角色為何？它們如何幫助我們書寫並理解歷史？職是，本專題旨在從理論與方法學及文本分析著手，探討語言與現實、政治論述與政治實踐之間重疊交織的關係，思考並梳理近現代中國／臺灣觀念形塑與概念變遷與廣義權力相關的政治行為與政治論述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以期掌握語言與政治、權力間的交互作用。

本專題共收錄四篇文章：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研究員邱偉雲〈觀念、語言、權力：中國近代平等譬喻修辭的政治再現〉一文，結合譬喻理論與觀念史研究方法，研究清末民初立憲派與革命派知識分子如何藉由「明喻」和「隱喻」等具有「喻體」與「喻依」的「譬喻」修辭手段，宣傳來自西方的近代政界平等觀，並為各自不同的政治立場與訴求主張所用。研究顯示：立憲派的平等概念以樹與根幹枝葉作譬喻，主要在鞏固君主國體，以避免張揚小我的個人主義而沖決大我的君主國體；使用毒種譬喻以強調平等觀念的正反兩面性結構，藉而提揭出社會上錯謬的平等觀念；透過競賽譬喻，強調推行君主立憲政體，人人可獲致參政權後的權利平等觀，而有別於君主專制政體下貧富貴賤有別的階級不平等。革命派使用刺梗／砒毒、天堂／地獄

² 參見鄭文惠：〈近代中國知識轉型與概念變遷／觀念形塑——觀念史／概念史方法與視域〉，《東亞觀念史集刊》第4期（2013年6月），頁236-255；方維規：〈概念史八論——一門顯學的理論與實踐及其爭議與影響〉，《東亞觀念史集刊》第4期（2013年6月），頁101-170；陳建守：〈語言轉向與社會史：科塞雷克及其概念史研究〉，《東亞觀念史集刊》第4期（2013年6月），頁171-222。

等二元譬喻，目的在強化革命派與立憲派的二元對立性，鞏固革命陣營的集體認同，並激起革命陣營對滿清專制主義、勞力階級不平等的對立立場與敵視情緒；至於播下平等觀念作為「種子」的譬喻，主要希望促成中國人從「臣民」轉為「國民」，以闡明革命平等觀的發展性與未來性。再者，兩個陣營雖同時以浸入作譬喻，但立憲派在揭示西方近代政界平等觀發展的全面性與不可逆性，以證明平等觀念的重要；而革命派則藉以強化革命平等觀的重要性與正當性。可見立憲派與革命派知識分子在報刊媒體空間中，分別使用切合自身政治立場與訴求主張的平等概念譬喻：一者，藉以發揚、鞏固自身的政治主張與政治立場；二者，攻擊、抵抗敵對方的政治訴求與政治修辭；三者，激發報刊閱聽者的大眾情感，進而調動起政治行動與集體認同。這種建立在「類化作用」(apperception)的心理基礎上，透過「借此喻彼」的「譬喻性建構的概念」，除利用舊經驗引起新經驗或作為溝通新觀念與舊世界的主要媒介，以達致新的認知結構而涵具啟蒙功能外，透過再脈絡化的概念譬喻以再現政治的同時，也不斷的進行著權力角力與政治斡旋，在形塑政治的合法性與正當化及強化意識形態化的集體情感認同上，發揮了巨大的作用與力量。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吳啟訥〈1950年代新疆突厥語族文字改革方案興廢背後的語言政治史〉一文，首先描述近代世界從奧圖曼—土耳其到俄—蘇境內的突厥語族文字改革，明顯可見政治力的介入與影響，與近代化、民族主義等思潮息息相關。繼而，鋪陳1926年蘇聯政府在境內各突厥語民族中推行以拉丁字母拼寫的新文字，取代長期以阿拉伯字母拼寫的舊文字，用以達致切斷突厥語穆斯林與波斯、阿拉伯伊斯蘭世界文化聯繫的政治目的。接續聚焦於1950年代中共主導下的新疆突厥語族文字改革的過程，及其隱涵的政治目的與權力角力的軌跡。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初期，對維吾爾文和哈薩克文使用的阿拉伯字母做了局部改造，然而，在「學習蘇聯」風潮之下，受蘇聯文字改革影響的維吾爾、哈薩克知識分子，訴

諸西里爾（Kirillica）化的文字改革的要求。1956年至1957年間，合作化運動和牧區社會主義改造等社會主義高潮在新疆境內造成了複雜、尖銳的反抗；正當新疆突厥語的西里爾（Kirillica）化文字改革與「反對大漢族主義」政治攻勢同步推展之際，漢語文的文字改革議題與「反右」政治運動打斷這一進程。1957年10月，漢語拼音方案最終確定使用拉丁字母，而非西里爾字母；同時「反右」也變調成爲新疆的「反對地方民族主義」運動。1958年1月，制定、推行與漢語拼音方案接軌的突厥語文字拉丁化方案。新方案的政治性目標在於中國國內各民族的團結與共同利益，文字改革的最終目標是使漢語逐步成爲社會交往的共同語言。然而，最後終因中共主導的文字改革方案「社會主義化」和「中國化」而於1980年代戛然中止，這是一種對於政治化文化政策的政治性反彈。

英國倫敦政經學院政府學系教授李蕾（Leigh Jenco）〈西方之外有「哲學」嗎？——「中國哲學之合法性」辯論與學科知識的全球拓展〉一文，以後殖民理論、比較政治學理論爲基礎，探討「中國哲學之合法性」論辯中所隱涵的學科、知識、政治、權力議題。千禧年之交，德希達（Jacques Derrida, 1930-2004）訪問中國期間，聲稱現代之前中國只有「思想」但沒有「哲學」的主張，重新引發一場針對中國思想與實踐的體系能否被有意義地理解爲或納爲現代哲學學科之「中國哲學之合法性」的激烈論戰。針對這場中國哲學合法性的論戰，論者或認爲主要動機在於文化認同，而非是與哲學基本構成有關的知識之實質性的辯論。作者則主張這場論戰，點出了幾項與知識全球化相關的重要議題，其重要性遠超過對於任何特定邊緣化思想體系的內部關注，既呈現出試圖將邊緣化文化思想體系納入既定學科的權力不對等的態勢，也隱晦地呈現出那些在「包容吸納」發生的同時，被遺忘或消音的可能替代性方案。作者首先回顧20世紀之交，胡適（1891-1962）、毛子水（1893-1988）、傅斯年（1896-1950）等知識分子選擇將某些中國知識遺產納入相關「哲學」範疇的初步嘗試，進而勾勒出兩

種不同的立場：一方試著將西方哲學領域擴大，以容納中國學術實踐；另一方則使用中國學術實踐的知識來質疑西方哲學範疇。這一塑造中國哲學史的行動中，一方面希冀使邊緣化的中國歷史，成為世界史的重要部分，但在使用歐洲哲學史術語作為新工具，對中國哲學進行解釋與科學化、系統化的過程中，無疑存在著對中國傳統根本上的重新詮釋與分裂，在某種程度上無異於民族同化。這也造成了近一個世紀之後，所出現的激烈的「中國哲學之合法性」論爭。針對「中國哲學之合法性」論戰中「擴展／抗拒」兩種立場，作者凸顯近現代以來「中國哲學之合法性」論辯所隱涵的政治權力與學科知識的全球拓展等重要議題。作者關注這場中國哲學合法性論戰的參與者，所提供將邊緣化思想體系恢復作為合法知識來源的具啟發性的可能方案，而不是將之視為無系統的思想資料庫、文化他者的標誌，或僅是歷史重建的資源。再者，作者也提出這些多元化的思想體系，以及包含哲學在內的全球性學術學科知識之間，可以或者應該如何建立關係？如果所有的知識體系，既受到原生知識表達形式所限制，但同時又受其豐富的內涵所挹注，那麼這二者間又當如何建立關係？最終作者立基於「比較政治學理論」，主張學科在融合擴展與再現知識上的努力從不止於知識層面，同時也一向是政治性的。這些努力不僅是立基於對於特定思想體系以及其區分標準之同異的智性爭論，也呈現在裁定這些思想體系的內部與外部界線的政治主張上。

捷克科學院亞非研究所研究員路丹妮〈從觀念的軌跡探究知識分子角色於國家領域內外之游移：以臺灣外省籍知識分子為例〉一文，運用德國社會學家卡爾·曼海姆（Karl Mannheim，1893-1947）知識社會學理論，聚焦於三位在1945年後渡海來臺的外省籍知識分子：代表戰後初期國家官員的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的教育處處長范壽康（1896-1983）；代表戰後初期教育家的臺灣師範學院院長李季谷（1895-1968）；代表出版界曾擔任多種重要期刊編輯的曾今可（1901-1971），分析其作為「意識形態載體」的論述文本在共時性的社會現實中，所呈現的知識

分子角色於國家領域內外之游移、權力場域位置與意識形態話語之間複雜多變的動力關係。作者首先爬梳三人生涯軌跡具有某種結構上的相似性；接續通過識別關鍵概念和嵌入這些概念的語義場（semantic fields），繪測三人在1930至1947年間面對詭譎多變的政治環境下觀念發展與變化的軌跡：中日戰爭之前的共同語義場，「新」與「舊」的二元對立，以及對「演化」（evolution）的強調，雖仍不脫五四新文化運動關注的議題，但三人所共同關注的一個重要語義場為「教育」；而個別差異上，范壽康在第二次國共合作時期，挪用較多馬克思主義論述中的生產力等詞彙，或取法俄國的計畫經濟等；曾今可站在「文化保守主義」（cultural conservatism）的立場，認為在混亂的時代，儒家傳統文化是協助國家發展成爲一個現代化新興國家的跳板；李季谷則以一歷史學者身分，對國共在面對日本占領滿州時所採取的反應，以及國民政府在捍衛領土與保護人民上所表現的無能，採取批判態度。就風格與文本的行動者而言，范壽康與曾今可最明顯的特徵是以意識形態化的「掩蓋策略」（strategy of concealing），在文本中掩蓋了行動者的存在；李季谷的文本風格則以論述事件、行動者及其行爲爲主，尤其將過往歷史事件放置在國際政治脈絡中加以闡釋。抗戰宣傳時期（1938-1945），三人共同語義場反映了同樣的政治情勢，因而書寫主題與風格趨多於與戰爭及軍事議題相關的詞彙，如「抗戰」、「戰區」、「抗戰的力量」、「軍隊政治工作」等；隨著戰爭的進展，語義場逐漸融入民族主義與戰爭動員，抗戰主題的語意脈絡變得更爲緊迫，意義叢顯得更加稠密。而「正義」與「和平」成爲重要的主題，主要是在國際正義與世界和平的框架中，除合法化中國的抗戰努力外，也是使中國政府獲得國際社會支持的正當性理據。此外，曾今可與范壽康論述中的行動者——日本與中國，分處對立的兩極，尖銳的修辭主要係爲政治宣傳；相較而言，李季谷並未採用宣傳式的語言。可見三人不同權力場域中的位置，實際反映出其對官方宣傳的遵從程度，曾今可與范壽康所處地位越接近核心，其論述就越接近官方政治宣傳

主張。在戰後初期臺灣，三人更加接近權力核心，被視為「體制內知識分子」。范壽康為轉化臺灣人的皇民化意識形態，消泯日本文化的影響，以奠基於「三民主義的正確思想」的「中國文化」的新內涵取而代之。藉著主張民族主義、儒家思想與三民主義共享的相同本質，范壽康建構出臺灣與中國之間的象徵性的精神紐帶。而李季谷的立場則在國民黨意識形態和文化保守立場之間擺盪：一方面支持清除「日本化」，一方面也支持中國民族主義。由於戰後世界進入「冷戰」時期的國際情勢，國共內戰從本來的小範圍突然擴大，「反共」成為全球問題。中華民國在反對共產勢力的鬥爭中，特別跟美國是盟友，因而益加強調中國與國際間的關係。如李季谷文章中，最主動的行動者為「蘇聯」，而「美國」比較跟心理活動的動詞有關，展示出來自蘇聯的真實危機須有所反應。曾今可則回到「文化保守主義」立場，持續捍衛傳統文化，主張傳統是中國文化中重要的穩定元素，值得珍惜並進一步發展。全文突出了知識分子分處在不同的權力場域的位置，實質影響著文章主題以及呈現方式。

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教授兼所長黃美娥〈臺灣「反共文學」創作範式的形構、邊界想像與作家經驗〉一文，首先提出一個新的研究方法論——將「反共文學」視為戰後臺灣文學史上重要創作「範式」，企圖翻轉臺灣文學發展史中「反共文學」創作審美評價過於單一化、負面化，且一再重複和停滯不前的論述框架。作者論析「反共文學」創作範式的形構與邊界想像，先鋪陳自1950-1980年代「反共文學」在戰後臺灣文學史上出現時的島內文壇狀態，逐而凸顯其與戰後初期文藝思潮的銜承、斷裂與嫁接的關係，及官方與民間推動、介入具高度政治性意涵的「反共文學」新範式。無論是蔣中正（1887-1975）、張道藩（1897-1968）、王集叢（1906-1990）等有關反共文學、戰鬥文藝的思維表述，與政府官方所公告的文藝政策與實施方案，或教育生產、報刊媒體的推波助瀾等，均可見官方與民間催生、形塑「反共文學」的宣傳方式與影響作用，明顯可見文藝教育與

反共文學範式生成的多層向關係。正因「反共文學」處在政治 / 文學之間的交構辯證過程中，在看似強制性、動員性的規範過程中，實質存在著一種對話、協商的軌跡，因而其邊界一直是游移、變動的，而並非處於穩固不動的狀態。此外，作者又在反共文藝思潮的文化場域下，分別就省外作家、本土作家與反共文學相接觸的經驗，以剖析書寫者的內在話語、作家個人與文學群體之迎拒反應、反共文學與作者之間的創作張力關係，及「反共文學」的思想內涵、敘事特徵與反共文藝理論的關係。在探究反共文學的藝術性與存在價值的同時，更翻進一層的論析與定位「戰後」臺灣從日治「臺灣文學」轉變成為「中國文學」之文學主體位移的關鍵時刻與變化歷程中，無論是書寫表達語文之轉換、文學觀點的轉變、文學畛域邊界的挪移，乃至文學創作場景、題材的取捨與更新、作品審美風格的改易，以及創作典範、敘事常規的更迭變異等，在 1950 年代出現的「反共文學」，無疑標誌著歷經殖民統治與內戰分裂後，奠基於國民黨政府意識、反共抗俄思想根源的新「文學想像共同體」所要學習與認知的新創作趨向。因而，就臺灣文學史的整體發展而言，「反共文學」自有其特殊的意義與地位。

綜觀專題各篇，或結合觀念史方法與譬喻理論，突出譬喻性建構的概念，除可達致新的認知結構、調動起集體認同外，也烙印著權力施作的痕跡，展演出語言與權力之間多重多向的動態關係；或分析 1950 年代新疆突厥語族文字改革方案興廢背後的語言政治史，無論是西里爾化的文字改革訴求，或是與漢語拼音方案接軌的突厥語文字拉丁化方案，均可見新疆突厥語族文字改革的過程，隱涵著複雜的政治目的與權力軌跡；或論述「反共文學」創作範式的文化政治，探究反共文學範式與作家主體之間所牽引出的國家體制、文藝政策、教育生產、知識話語、文學本體、創作策略之間互涉互動的多維度、多層向的關係網絡，從而重新賦予「反共文學」在臺灣文學史上新的定位與意義；或立基於比較政治學理論，探討「中國哲學之合法性」辯

論所涉及的政治、權力，及學科知識的全球拓展與流動，揭示出學科在融合擴展與再現知識上從不止於知識層面，同時也深具政治性動因與目的；政治與權力不僅產生知識，政治與權力同時也產生將知識理論化的方法；或援用知識社會學理論，探測知識分子游移在國家領域內外的邊界，以凸顯行動者因應著不同的時代現實與權力場域位置，而有不同意識形態化的立論主張，也呈現出不同的觀念發展軌跡的變化與波動、斷裂與連續；越接近權力場域，則越傾向認同官方宣傳。專題各篇論文為語言的權力、權力的語言相關的研究課題帶來了新的研究視野與方向，提供了一種結合理論方法與文本分析的論述框架，拓深了語言與政治、權力間交互作用的研究領域。